

一部新的
中国货币史

白 银

修订版

徐瑾
著

货币三部曲

帝 国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不是金银
一部从币制窥探国家兴衰的政经史

系列作品由耶鲁大学推出全球英文版，获《华尔街日报》《亚洲书评》等权威媒体推荐

吴 思
著名历史学家

朱嘉明
著名经济学家

韦 森
复旦大学

马德斌
牛津大学

王 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

联袂
推荐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修订版）

作者：徐瑾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8-01

ISBN：9787208183131

品牌方：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名家推荐

从本书提供的视角看去，熟悉的历史世界呈现出自己的侧影。东西并列，轮廓分明，清晰而有神。好看。

吴思，著名历史学家，《潜规则》作者

货币与货币制度，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在历史上也常是一国社会秩序紊乱、崩坍乃至王朝兴替的催化剂。人类在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与追求个人财富和福祉的过程中，创生了货币与货币制度，也一直困扰在货币与货币制度的迷宫和幻象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已经解决了货币与货币制度问题，因此，人类各个社会均处于自发演进的必然王国之中。经济学研究人员在货币与货币制度问题上大都还在盲人摸象。就此而言，研究货币和货币制度史，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在这部《白银帝国》中，青年经济学人徐瑾以她优美的文笔、翔实的史料、宽广的视野，在中外历史的对比中讲述了中国千年货币史，发人深思，促人警醒。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货币史多年的专家和思想家，朱嘉明教授为本书所撰写的长序，更是画龙点睛之笔。这部著作不但会增加人们有关货币制度史的历史知识，对把握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朱嘉明，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

学术技术委员会主席

货币是理解人类文明与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但货币史不容易写好，中国货币史尤其难写。《白银帝国》抓住白银在中国作为货币既普

遍又特殊的现象，生动地勾画出中国千年经济史的演变路径，内容不仅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深入国家政治、财政、金融制度等领域，也对中西大分流这样的重大议题有精彩的讨论。此书面向大众，将小说、戏剧里隐含的信息与严肃的学术著作巧妙融合，给读者呈现出一幅丰富形象的传统中国经济史图景。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从专业角度看，此书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史学上，都彰显了作者的深厚功底和积累，字里行间充满思想的火花，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也有新的思考，在此愿向所有关注中国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读者大力推荐。

马德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

徐瑾女士视野独特，文笔了得，以白银斑驳游离之脉络梳理了中国货币史，纲举目张，甚为聪明。检点千年以来从金属货币到朝廷，再到体制的威权与利益变迁，可以从中体验人性与观念的冲突。好的逻辑，才会有好的故事。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的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徐瑾女士所撰写的《白银帝国》，考察了从960年建立的宋朝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间跨度近1 000年的细密经纬货币史，并描述和诠释了其中那根“连绵不绝”、隐匿无比和充满“纠缠”与“纠结”的银线。

(1) “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白银货币究竟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无定论。据学者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至于其被中外史学家认为是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相比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导致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以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范畴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西夏和金，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的钱币，但是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

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度稀缺，在纸币通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这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所言的“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宋代因为通胀引发白银崛起的结论。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且政府税收中的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有清楚的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抑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与腐败的吏治，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最终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之中。徐瑾在书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充分商业环境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他并不能拥有更多的选项，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最终成为“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2) “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花刺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以铜和铜钱为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的白银与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唤起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多手准备，撤离中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正统初年（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宣德五年（1430年）以周忱为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毫无疑问，在这百年间的白银需求产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则其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似乎也不合理，因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的时候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都实行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而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正统初年（1436年）至16世纪40年代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互动，这个时段接近一个世纪。

(3) “白银纠缠”和1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16世纪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清朝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

歪曲。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出版的《明朝那些事儿》，用通俗手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此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并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造成美洲白银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6世纪40年代。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还催生了诸多的社会变革。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正是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她还特别提到，“《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白银成全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在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中，卷一、卷二提供了众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6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以16世纪40年代作为起点，当时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的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也因此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汉学家崔瑞德和牟复礼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两个

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以及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由于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发生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社会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其中的原因很多，而崇祯末年发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上涨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值和通胀，以及国家经济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同是1644年，英国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7世纪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4) “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正如徐瑾在文中所言，“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金银复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制度”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而变动。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修订版）》徐瑾.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994.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